

令編者欣慰的是，本刊文章能激起讀者的思考。無論是對照歐盟的理念來反省中國和東亞的現狀及未來；或是談如何評價明末耶穌會士傳來的天文知識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以及以何種標準來評判，都是很有意思的討論。時值2003年初，本刊編輯同人祝各地作者、讀者春節快樂，也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更積極支持本刊。多謝！

——編者

歷史的坐標應如何定位？ ——與江曉原先生商榷

頃閱《二十一世紀》2002年10月號江曉原先生大文，文中點到賤名（註3、4）。謹略申鄙見如次。（按，註4所提原文，曾經該刊編輯大加刪節，已非原貌。全文請看拙作〈論徐光啟的哲學思想〉，載《清華大學學報》，1987年2卷1期。收入《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一書中。）

1、明末修曆所採西洋新法（儒略曆）之優於舊曆（大統曆）無待贅述，這是連封建皇朝都已認知的，否則就不會用新法代替舊法。但新法之優於舊法以及哥白尼已經在華為人所知，並不意味中國方面已經認識近代科學。這裏是兩個性質不同抑且層次不同的問題。

2、我所稱的近代科學係指經歷開普勒（Kepler）、伽利略（Galileo）以迄牛頓所完成的大業。所謂近代科學，歷史地規定了只能是指牛頓的經典體系，而不是任何別的。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3、中國當時面臨的歷史課題乃是近代化，而近代化最重要的契機端在於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近代科學屬於一個系統工程，其建立尚需要近代思想方法論與之配套（F. Bacon, R. Descartes, B. Pascal等）。耶穌會的成立是針對宗教改革的。僅僅從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即三個半世紀之後，羅馬教廷才為伽利略平反，即可想見。當時伽利略受羅馬教廷迫害被判刑，其罪狀即是他傳播了哥白尼學說，伽利略的認罪書也承認自己犯了傳布哥白尼學說的罪行。而同時來華的耶穌會士，豈能居然傳布哥白尼學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聖誕老人是不會真送禮物來的。

4、當時傳教士帶來了若干新器物和新知識（對中國來說，是新的），但這些與中國近代化的大業並無實質的關係。近代化最重要的契機乃在於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的確立，不在於哥白尼的名字何時以及如何為中國所知。日心說是古希臘即已有之的，歐氏幾何也是古希臘的。當時各種所謂的「遠西奇器」亦均不出古代靜力學的範圍。

5、哥白尼並不等於近代科學，第谷（Tycho Brahe）也不等於近代科學。只有近代科學和近代思想才是當時中國之所

需，而這恰好是這批聖誕老人所沒有、而且也不可能送來的。不宜採取這樣的邏輯：哥白尼就是近代科學，傳教士提到哥白尼就是送來了近代科學。

6、中國真正的近代化以及引進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乃是十九世紀後期的李善蘭、康、梁、嚴等一輩人。請想，正是西方殖民者開發美洲大陸之際（也是耶穌會士來華之時），土著印地安人連車輪都還不會製作。可是今天少數印地安人的子遺作為瀕危物種被保護起來，也坐上了林肯牌和卡狄拉克牌的轎車以及波音747和協和式客機了。然而，這又何補於他們整個民族悲慘的淪亡？歷史的坐標應該只能是定位在近代化上。如果不是在這裏，又能在甚麼別的地方呢？

7、遲至十九世紀之初，阮元還搞不清楚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區別何在。這表明中國科學家在西方傳教士長期蒙蔽之下那種一片惶惑、莫知所從的心情。在這一點上，阮元乃是受蒙蔽者，而不是蒙蔽者。

8、學術作為天下之公器，本是相互磋切之事。他日倘能證明當年西方傳教士確曾傳來了近代科學，我將欣然放棄我原有的觀點。

何兆武 北京
2002.11.24

從歐洲的聯合看未來中國的「統一」

在《二十一世紀》2002年11月號網絡版上，我讀到陳彥的〈歐洲悖論與歐洲的聯合〉一文，如同遇到知音。

正如作者所言，歐洲聯合「是人類歷史上以民主方式走向政治聯合的獨一無二的社會工程」，是盧梭、康德、雨果等大思想家構想的實現。歐洲聯合帶給思想家們太多太多的思考，更為我們東方當政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歷史事實。

源於人類實踐理性的「烏托邦」，難道真像我們一直所批判的那樣是海市蜃樓嗎？三權分立、代議選舉制是歐洲啟蒙思想家為人類設計的理想社會制度。這個制度雖然仍有缺陷，但其優點也是人類歷史曾經有過的其他制度所無法比擬的。今天，歐洲走向統一，再一次以事實說明，人類可以把自己的理性思想追求（「最後的烏托邦」）變為現實。面對這種現實，大陸還要一味死守住「歷史決定論」、死守住「中國特色」這一為自己的專制統治找托辭的思想觀念嗎？

歐洲統一的先決條件是歐盟各個國家必須遵守「民主、人權、市場經濟」，必須承認自身主權的相對性。歐洲的統一說明，「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民族國家的主權觀不是不可以向人權讓步的。聯繫到未來中華的統一，是否不應再着眼於建立一個龐大的、由大陸當主、港澳為輔這種模式所組建的另一個具有傳統主權的民族國家？而應是在平等協商的前提下達成的、一個類似今天

歐洲統一的、主權受限的新型自由民主國家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內，各成員均有自己的相對主權。今天，大陸雖然完成了港澳的回歸，但這種回歸的出發點是傳統意義的主權，即外交權和軍事上的統合，而不是真正應完成的自由統一的貨幣、法律方面的新型統一。

靈山 北京
2002.12.14

歐洲聯合、美國霸權與理想主義的重建

歐洲聯合的力量衝破了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理論的框架，給不斷遭到懷疑的理想主義一份新的激情和自信。對這場變革的關注已經超越了歐洲聯合本身原有的範圍和它原初的意義。然而對這種深刻變革的理解程度卻有着很大的區別。莫蘭 (Edgar Morin) 在〈從歐洲命運共同體到全球命運共同體〉一文（《二十一世紀》，2002年10月號）中所表達的對歐洲聯合的理解和闡釋，卻是沉溺於現實主義思維、對理想主義缺乏激情和想像力的我們所難以做到的。

誠如莫蘭所說，歐洲文化具有二元邏輯，既崇尚法也崇尚力，既有民主也存在過壓迫。然而它始終有一股否定和超越的力量。這不僅是歐洲文化和精神的動力，它所產生的價值也成為非西方國家從西方國家的統治和自身體制與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種武器。它也將成為將歐洲命運共同體拓展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不竭動力。歐洲文化的這種

否定和超越的力量，連同它伴隨的理想主義，通過康德、雨果等人的思想，並得益於莫內、舒曼等人的實際推動，為人類建構起一個新的存在框架，一個新的共同體。

同一期的〈全球公共產品與美國霸權〉論述美國霸權和公共物品。在莫蘭文章的啟示下，我卻不能止步於對美國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分類。我所看到的美國霸權不再只是所謂的強權和霸道，我看到了在另一邊所顯示的領導、責任、自由與理想。這裏同樣有着歐洲文化、歐洲理想主義的血脈。這些為它的霸權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強化了它的軟實力 (soft power)。美國的霸權雖然有我們中國人所反感的霸道，但仍有其合法性基礎和生命力。它依靠的不只是物質性的權力。

東亞人還沒有從現實主義的泥潭中走出來，這一方面是歷史鑄造的結果，另一方面，卻是由於東亞文化的缺陷。東亞的一極將甚至沒有美國的霸權所擁有的合法性，有的只是物質性權力。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心胸狹隘、沒有自省的日本能承擔為全球共同體的建構提供精神元素。因此，中國人應該從歐洲那裏尋找理想，從康德、雨果那裏找到一種特別的智慧與激情。惟有如此，當東亞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時，它也能體現出領導、責任、自由與理想，能成為屬於全球共同體一部分的一極。

丁松泉 北京
2002.12.11